

南阳市博物馆建馆五十五周年纪念文集

继往开来

主编 柳玉东 张晓刚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南阳市博物馆建馆五十五周年纪念文集

继往开来

柳玉东 张晓刚 主编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继往开来 : 南阳市博物馆建馆五十五周年纪念文集 /
柳玉东, 张晓刚主编. -- 西安 : 三秦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518-0841-5

I. ①继… II. ①柳… ②张… III. ①博物馆 - 工作
- 南阳市 - 文集 IV. ① G269.276.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64479 号

继 往 开 来

柳玉东 张晓刚 主编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 话 (029) 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南阳市寰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42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0841-5

定 价 38.00 元

《南阳市博物馆建馆五十五周年纪念文集·继往开来》编委会

主 任：柳玉东

副主任：张晓刚 张朝霞 王玉君 辛明成

主 编：柳玉东 张晓刚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升平 牛宏成 尹俊敏 李凡空

李 红 李成广 林丽霞 罗松晨

周 励 徐宏伟 高君平 郭 靖

郭小霞 黄迎光 魏旭东

序 言



在全局上下认真贯彻执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伟大历史进程中，迎来了南阳市博物馆建馆五十五周年华诞，至此硕果累累满载喜悦的时刻，由南阳市博物馆组织专家精心编著的《继往开来》论文集付梓出版。今年时逢“智圣”诸葛亮仙逝1780年，这是南阳文博乃至文广新系统的盛事，在南阳博物馆的建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龙岗胜迹苍翠，文博殿堂生辉。《继往开来》论文集设计精美，厚重大气，内容涉猎广泛，门类齐全，既有文物考古的最新发现，又有博物馆陈列展览及宣传教育的实践探索，既有三国及卧龙岗文化的深度挖掘，又有古建园林的有益尝试，是南阳文博工作者实践和学术的智慧结晶，不愧为新时期一部系统全面反映南阳文博战线学术研究理论成果的集成之作。

回顾往昔，思潮万千。南阳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曾给南阳留下丰富文化积淀和文物遗存，2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万余件文物藏品，虽历经岁月风雨却风姿依旧，彰显着南阳文化的博大精深。南阳市博物馆的发展倾注了一代又一代博物馆人的心血和汗水，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南阳一批著名学者董作宾、郭宝均、孙文青、张中孚等就开始搜集、整理南阳历史文物，并于1935年成立南阳民众教育馆，为南阳市博物馆的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1959年春季，当时的中共南阳市委根据地委指示，以卧龙岗武侯祠为基地，成立南阳历史博物馆和卧龙公园，至此，南阳首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1965年，南阳历史博物馆更名为“南阳市博物馆”，馆名一直沿用至今。

南阳市博物馆是一座馆（博物馆）祠（武侯祠）园（公园）三位一体的文化娱乐活动场所，也是一座文物古迹、风景名胜、人文景观、游览观光相互融合的大型地方综合博物馆，豫西南最大的地方综合性博物馆、河南省优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南阳市博物馆所在地南阳武侯祠，位于南阳市西郊卧龙岗上，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故址和历代敬拜诸葛亮的地方，也是汉昭烈皇帝刘备三顾处，历史上著名的“三顾茅庐”和“草庐对策”就发生在这里。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河南省文明旅游风景区。祠内碑石林立，匾额楹联琳琅满目，蔚然成景。保存着汉代以来的碑刻400余通，匾额楹联200余幅，书法真草隶篆无所不具，内容纷繁丰富，记人记事歌咏题记均备，在全国武侯祠中当居

首位。其中最为出名的当属清代南阳知府顾嘉衡撰写的名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辩襄阳南阳。”1959年9月，时任团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南阳卧龙岗武侯祠时，对这副楹联很是欣赏，并妙改为：“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将这副楹联赋予新的内涵和意义，彰显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宽广胸襟和高尚情操。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南阳市博物馆和卧龙岗武侯祠的保护工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共南阳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南阳市博物馆认真贯彻执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和指导思想，先后对卧龙岗武侯祠古建筑进行以精雕细刻、营造卧龙岗环境、再现诸葛亮躬耕地历史原貌为指导思想的维修整治活动，连续多年成功举办“中国·南阳诸葛亮文化旅游节”，即继承传统文化，又赋予时代气息，极大地提高了南阳卧龙岗武侯祠的景区品位。2007年和2008年，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视察南阳卧龙岗武侯祠。两位国家领导人在南阳卧龙岗武侯祠的发展史必将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被誉为“卧龙胜迹，千载一遇”。近年来，南阳市博物馆新馆建设受到中共南阳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正在筹建之中的南阳“三馆一院”，河南省十大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区之一、以“智谋天下、传奇卧龙”为核心理念的卧龙岗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区，让南阳市博物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时代挑战，必将使南阳市博物馆和卧龙岗武侯祠发生了有史以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南阳市博物馆作为南阳文化宣传阵地和旅游窗口单位，自1959年建馆以来，经历了55周年的风风雨雨，她伴随着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正逐步走向辉煌，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南阳市博物馆的发展，引人自豪，催人奋进，她作为一个地方综合性博物馆发展史上一个缩影，将永远铭记史册。

展望未来，任重道远。今借《继往开来》论文集付梓出版之际，殷切希望南阳文博工作者，以建馆五十五周年为契机和起点，在新的历史时期，默默奉献，锐意进取，勇于担当，敢于创新，使博物馆的各项工作蒸蒸日上、突飞猛进，为南阳文博和旅游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是为序。

（作者：苏定堃，南阳市文广新局局长、党委书记）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日

目 录

序言	苏定堃 (1)
汉代的厚葬之风与曹操的“未得遵古”之令	王建中 (3)
《资治通鉴》记载诸葛亮躬耕地问题考辩	赵保佑 (11)
如果看待《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文中与诸葛亮躬耕地相关的史料	石小生 (16)
卧龙书院旧址及其相关问题考	柳玉东 (22)
诸葛亮勤廉思想和作风的永恒意义	张晓刚 (26)
刘备入蜀 1800 周年的深思	王广深 王建中 (31)
应是“草庐对”	张晓刚 (34)
南阳武侯祠元至正四年碑及其相关问题考	柳玉东 (36)
浅析《草庐对》形成的历史条件及对蜀汉政权的影响	房凌云 (40)
浅谈三国文化的大众化	郭雪梨 (44)
不能往诸葛亮身上泼污水 ——对抵毁诸葛亮现象的思考	张晓刚 (48)
浅谈武侯祠碑刻的文学及书法艺术价值	李桂阁 (50)
南阳卧龙岗碑刻书法艺术赏析	牛宏成 张洪静 (55)
浅析南阳卧龙岗碑刻的史料价值	周 励 (59)
南阳卧龙岗香社和庙会的由来及演变传承	刘 霞 (63)
南阳武侯祠田沛楹联赏析	郭 靖 (68)
武侯祠与“三”文化	田钰新 (70)
有关《卧龙岗全景图》的几个问题	张 嵩 (75)
试析馆藏“三国文物”的内涵及价值	李凡空 (83)
从“商”字看商族的图腾与商族的名称	尹俊敏 (87)
论石器时代的骨角器	任义玲 (92)
寂寞嫦娥舒广袖 ——从南阳汉画像石“嫦娥奔月”浅析汉代美女造型	王玉君 (98)
谈南阳地区的盘鼓舞汉画石 (砖)	宋 华 马 艳 (102)
汉代画像中的雅乐与俗乐	张 晗 (108)
李孟初神祠碑考	姚 军 (114)
百里奚“心与牛一”的治国思想	陈 静 (120)
“五穀大夫”百里奚故里南阳考	陈 涛 (123)

范蠡的经济思想价值及其历史评价	乔庆功 (126)
南阳楚长城的调查及保护浅谈	包明军 齐延光 (130)
浅谈南阳玉文化及其历史地位	甄红勇 (135)
论张衡赋与汉代乐舞艺术	郭 帅 (139)
河南桐柏县馆藏宋庆历年间铁旗杆座	罗 栋 郑大宇 (142)
南阳历代书院发展概述	罗松晨 (145)
郭沫若与南阳	刘文华 (153)
南阳市西关煤场住宅楼汉墓发掘报告	曹石磊 魏晓东 (158)
略述智慧文博景区建设	罗松晨 (162)
浅谈数字化在博物馆工作中的应用	郭小霞 董源格 (166)
浅谈博物馆信息化	李勇树 (170)
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 拓展博物馆服务途径	李 红 (174)
浅论博物馆在文化发展建设中的作用	吴新会 (178)
如何更好发挥博物馆的教育功能	林丽霞 (183)
办好陈列展览 服务社会大众	王 克 (187)
如何提高博物馆讲解员的讲解艺术美	刘红玉 (190)
浅谈博物馆研究型讲解员的培养	倪小玉 (194)
问答法讲解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	张 洋 (197)
博物馆工作的思考	吕亚梅 (199)
南阳卧龙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与创新刍议	张朝霞 (202)
南阳武侯祠古柏亭抢修加固始末	王歌莺 (207)
南阳武侯祠的建筑文化	裴明瑞 (213)
南阳武侯祠的建筑特色和文化价值初探	汪 锐 (217)
南阳武侯祠古建筑白蚁防治实践及思考	刘 灏 (220)
浅议南阳武侯祠园林的白蚁防治	魏旭东 (224)
古建消防安全特殊性初探	李 远 (228)
金属类文物保护修复方案编写标准化实施过程中的若干问题	赤银忠 (233)
两汉碑刻画像石拓印、装裱与拓片保管技术	
——以汉许阿瞿墓铭画像石为例说起	王升平 (241)
清代禹之鼎作品揭裱修复	刘 琳 (247)
古旧字画揭裱心得	陈梦园 (250)
附录:《光明日报》(2013年5月27日《国学》版):	
汉之南都 时势英雄——“历史名人与南阳”座谈纪要	(253)
后记	(260)

目 录

序言	苏定堃 (1)
汉代的厚葬之风与曹操的“未得遵古”之令	王建中 (3)
《资治通鉴》记载诸葛亮躬耕地问题考辨	赵保佑 (11)
如何看待《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文中与诸葛亮躬耕地相关的史料	石小生 (16)
卧龙书院旧址及其相关问题考	柳玉东 (22)
诸葛亮勤廉思想和作风的永恒意义	张晓刚 (26)
刘备入蜀 1800 周年的深思	王广深 王建中 (31)
应是“草庐对”	张晓刚 (34)
南阳武侯祠元至正四年碑及其相关问题考	柳玉东 (36)
浅析《草庐对》形成的历史条件及对蜀汉政权的影响	房凌云 (40)
浅谈三国文化的大众化	郭雪梨 (44)
不能往诸葛亮身上泼污水 ——对抵毁诸葛亮现象的思考	张晓刚 (48)
浅谈武侯祠碑刻的文学及书法艺术价值	李桂阁 (50)
南阳卧龙岗碑刻书法艺术赏析	牛宏成 张洪静 (55)
浅析南阳卧龙岗碑刻的史料价值	周 励 (59)
南阳卧龙岗香社和庙会的由来及演变传承	刘 霞 (63)
南阳武侯祠田沛楹联赏析	郭 靖 (68)
武侯祠与“三”文化	田钰新 (70)
有关《卧龙岗全景图》的几个问题	张 嵩 (75)
试析馆藏“三国文物”的内涵及价值	李凡空 (83)
从“商”字看商族的图腾与商族的名称	尹俊敏 (87)
论石器时代的骨角器	任义玲 (92)
寂寞嫦娥舒广袖 ——从南阳汉画像石“嫦娥奔月”浅析汉代美女造型	王玉君 (98)
谈南阳地区的盘鼓舞汉画石 (砖)	宋 华 马 艳 (102)
汉代画像中的雅乐与俗乐	张 晗 (108)
李孟初神祠碑考	姚 军 (114)
百里奚“心与牛一”的治国思想	陈 静 (120)
“五羖大夫”百里奚故里南阳考	陈 涛 (123)

范蠡的经济思想价值及其历史评价	乔庆功 (126)
南阳楚长城的调查及保护浅谈	包明军 齐延光 (130)
浅谈南阳玉文化及其历史地位	甄红勇 (135)
论张衡赋与汉代乐舞艺术	郭 帅 (139)
河南桐柏县馆藏宋庆历年间铁旗杆座	罗 栋 郑大宇 (142)
南阳历代书院发展概述	罗松晨 (145)
郭沫若与南阳	刘文华 (153)
南阳市西关煤场住宅楼汉墓发掘报告	曹石磊 魏晓东 (158)
略述智慧文博景区建设	罗松晨 (162)
浅谈数字化在博物馆工作中的应用	郭小霞 董源格 (166)
浅谈博物馆信息化	李勇树 (170)
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 拓展博物馆服务途径	李 红 (174)
浅论博物馆在文化发展建设中的作用	吴新会 (178)
如何更好发挥博物馆的教育功能	林丽霞 (183)
办好陈列展览 服务社会大众	王 克 (187)
如何提高博物馆讲解员的讲解艺术美	刘红玉 (190)
浅谈博物馆研究型讲解员的培养	倪小玉 (194)
问答法讲解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	张 洋 (197)
博物馆工作的思考	吕亚梅 (199)
南阳卧龙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与创新刍议	张朝霞 (202)
南阳武侯祠古柏亭抢修加固始末	王歌莺 (207)
南阳武侯祠的建筑文化	裴明瑞 (213)
南阳武侯祠的建筑特色和文化价值初探	汪 锐 (217)
南阳武侯祠古建筑白蚁防治实践及思考	刘 灏 (220)
浅议南阳武侯祠园林的白蚁防治	魏旭东 (224)
古建消防安全特殊性初探	李 远 (228)
金属类文物保护修复方案编写标准化实施过程中的若干问题	赤银忠 (233)
两汉碑刻画像石拓印、装裱与拓片保管技术	
——以汉许阿瞿墓铭画像石为例说起	王升平 (241)
清代禹之鼎作品揭裱修复	刘 琳 (247)
古旧字画揭裱心得	陈梦园 (250)
附录:《光明日报》(2013年5月27日《国学》版):	
汉之南都 时势英雄——“历史名人与南阳”座谈纪要	(253)
后记	(260)

汉代的厚葬之风与曹操的“未得遵古”之令

王建中

摘要：汉代是我国历史上崇尚厚葬的时代。因贵族地主阶级的墓中“厚资多藏”，这就为在军阀混战中缺乏军费的曹操提供了盗墓之机。曹操去世前，出自代汉立魏及防盗的需要，诏令“未得遵古”之制，结果是自己的坟墓还是多次遭到古今盗墓者的盗掘，并由此引发一场真假曹操墓的学术之争。

关键词：厚葬；盗掘；曹操墓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崇尚厚葬的社会。其主要表现是贵族地主死后，不仅在墓的形制和结构上模仿现实生活中的房屋，而且在随葬品方面也尽量做到应有尽有，所谓“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由于人生的不公连带出人死后的差异，这就难免造成农民发墓“鞭尸”，乃至揭竿而起的反抗斗争；同时，也使包括曹操在内的挖坟取宝者盗掘古墓的活动频频发生。东汉末年，曹操从代汉立魏的政治需要及避免死后已墓被盗的故事重演，诏令“禁厚葬”，“未得遵古”之制，并带头实施“不封不树”的薄葬。但后来，他的坟墓也还是遭到了盗掘，并在今天被彻底曝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

（一）汉代是贵族地主阶级崇尚厚葬的时代。主要表现是：1.人死后，必欲以布、帛、锦包被。皇帝和贵族则追求用金丝、银丝、铜丝编缀而成的“玉衣”（玉匣）入葬。2.盛尸以棺，棺材必为江南梓、楠、柏、樟等珍贵木材。3.人自初死至安葬，其间停尸特长，最长者达433天^[1]。4.上自天子，下至臣民流行以财物助人办丧事（赙）和送给丧家送葬之物（赠）之礼。5.柩行，载之以车，以车贵客多为荣。6.墓的形制（平面布局）和结构（构筑墓室的建筑材料），模仿现实生活中的居住建筑。7.“厚资多藏(葬)，器用如生人”^[2]。8.坟墓为汉人所重，天子、重臣皆于生前营造陵园或茔地。

（二）汉代流行厚葬之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这是由于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大帝国，西汉和东汉两朝达四百余年之久，政治局面比较安定，农业、手工业、商业比较发达，天子以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死后皆具厚葬的物质条件；其二，在汉代贵族地主阶级中流行的丧礼和葬俗，其中心思想之一，是把死人当生人看待，即《论衡·薄葬篇》所说的“谓死如生”。所以，不仅在墓的形制和结构上仿现实生活中的宅第建筑，而且在随葬品上极力做到应有尽有。凡生人所用的器具、物品，无不纳入墓中；其三，汉代贵族地主阶级始终把“孝悌”作为儒家思想核心“仁”的重要内容，并把“举孝廉”作为选拔官吏的制度。对父母“生不极养”，但“死乃崇丧”^[3]者便可成为入仕的一个重要条件。通过大操大办丧

葬，既可“崇飭丧纪以言孝”，又可“盛宴宾客以求名”^[4]，还可借“赙赠”之礼以发财。

汉代的厚葬之风并不是人人都崇尚，个个都可以厚葬的，曾为南阳郡水利事业做出卓越贡献、有“杜母”之称的太守杜诗死后，竟无钱可殓，无地可葬^[5]。因破产沦为奴婢，或被判罪而成为刑徒的人，只能葬入没有任何葬具的土坑竖穴墓或万人坑中，伴随一块刻有所属监狱机构、犯罪名称、死亡日期的“刑徒砖”^[6]。

（三）汉代的厚葬之风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沉重负担，甚至是灾难。一是劳民。汉制、天子即位后便开始筑“寿陵”。以节俭著称的西汉文帝死前（后），朝廷征发近县卒16000人，内史卒15000人为其穿山凿墓^[7]。汉武帝所筑的茂陵，每边长230米，高46.5米，用夯土筑成，前后长达53年，动土时栽的小树，至帝下葬时已两手合围粗细^[8]；二是伤财。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共用金丝1100克，玉片2498片^[9]。北京大葆台西汉燕王墓，用五棺二槨之制，由14000根黄肠木（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垒成题凑（木头皆内向），折合木材约122平方米^[10]。河南密县打虎亭一号东汉画像石墓，共用大青砖90000余块，石材达900立方米^[11]。三是造成财政枯竭。西汉成帝昌陵，“因卑为高，积土为山”，营建陵墓的徒工“以钜万数”，“国家罢敝，府臧空虚”^[12]，以致影响到对匈奴郅支单于入侵的战争；四是加重了人民负担。每有丧葬“都官属县，各当遣吏赍奉，车马帷帐，贷假待客之具，竞为华现”，“作烦搅扰，伤害吏民”^[13]。西汉元帝少府欧阳地余死后，“少府官属共送数百万”。西汉孔光死，公卿百官会吊送葬，“车万余辆”。汉郑玄卒，“自郡守以下受业者缙绶赴会千余人”^[14]。吏民即使无“担石之储”，也要“将财力尽于坟上”。结果仅“一饗之费用”，就“破终身之业”，甚至造成“子孙饥寒绝命于此”^[15]；五是破坏了生态环境，占用了大量农用耕地。东汉中山王死后，朝廷“大为修家茔，开神道，平夷吏人家墓以千数，作者万余人。发常山、钜鹿、涿郡柏黄肠杂木，三郡不能备，复调余州郡工徒及送致者数千人，凡征发摇动六州十八郡”^[16]。西汉诸帝陵区均设置有帝陵邑。长陵邑占地面积约为99000亩；六是传统的丧礼和葬俗发生扭曲，“墓而不坟（不封土、不树碑）”，“坟而不崇”的丧葬制度遭到破坏，社会上盛行“以厚葬为德，薄葬为卑”^[17]的不正之风；七是加剧了农民的起义与农民发墓鞭尸的反抗斗争。《后汉书·刘盆子传》：“赤眉发掘诸陵……遂污辱吕氏尸”；八是诱发了以董卓、曹操等贵族地主阶级为代表，以及民间盗墓取宝活动的频频发生。《后汉书·董卓传》“及何后葬，开文陵（东汉灵帝陵），（董）卓悉取藏中珍物”。又董卓“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宝”。

二

（一）曹操人生中的盗墓之过。曹操（公元155-220年），不是三国人，是东汉人，且是东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是对中国历史发展曾起过进步作用、值得肯定的人物。毛主席生前曾精辟指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他改变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抵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难道不该肯定。”^[18]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曹操反对自西汉以来的厚葬之制，主张薄葬，并带头实施薄葬，为移奢侈之风，易厚葬之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曹操也有一些不能不提的罪过及品行不端的过失，这就是除了镇压黄巾农民起

义，东征屠徐州，南征使曹仁屠宛城（今南阳市），置功臣荀彧于死地，杀华佗，使一批珍贵的医学宝典毁于一旦外，还有一些至今不为道德和法律所接受的活动，其中之一就是盗掘商丘永城西汉梁孝王墓事件。

（二）“厚资多藏”是梁孝王墓被盗的主因。梁孝王，即西汉刘武，“孝文宣帝子也，而与孝景帝同母。母，窦太后也”。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立为代王，四年徙淮阳王，十二年徙为梁王。吴楚七国之乱，他坚守睢阳。吴楚破，“所虏吴楚之捷（战利品），略与汉等”。因与帝至亲，赏赐不可胜计，“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府库金银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六月六日卒，“谥曰孝王”。史载，武“及死，藏（葬）府余黄金尚四十余万斤”^[19]，其他的财物价值也与此相当。梁孝王死后，梁国被一分为五，其王国范围和经济实力都大大的削弱。西汉末年，“莽篡国绝”，从此结束了梁国长达二百余年的历史。

《史记·索引》等记载，梁孝王墓在永城北五十里，砀山南岭山（保安山），高百丈，周迥一里，其冢斩山作廓，穿石为基（即所谓“崖墓”）。由于墓内有“四十余万斤”黄金及其他珠玉珍宝，又有相对明确的地理位置，这样，梁孝王墓便不可避免地成为两汉盗墓者，其中包括曹操在内重点盗掘的对象之一。

（三）曹操盗墓的龌龊履历。陈寿《三国志·魏书·袁绍传》云：“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太祖（曹操）自东征（刘）备……备奔（袁）绍。”南朝裴松之引东晋孙盛（《魏氏春秋·绍檄州郡文》），为“备奔绍”注曰：曹操的祖父曹腾，“饕餮放横，伤化虐民”；曹操的父亲曹嵩“窃盗鼎司，倾覆重器”；曹操本人“本无会德”，“好乱乐祸”。又“梁孝王，先帝（西汉景帝）母弟，坟陵尊显，松柏桑梓，犹宜恭肃，而（曹）操率将校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宝，至今朝流涕，士民伤怀。又署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堕变，无骸不露”。

上述檄文主要向国人公示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曹操祖孙三代均为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二是梁孝王墓为西汉景帝刘启之弟刘武之陵，庄重而显贵；三是司空（掌管工程）曹操亲率将校吏士前往盗墓，掘棺戮尸，略取金宝；四是曹操的盗墓活动引起国人一片哗然，献帝及文武百官为之落泪，天下士民为之心寒；五是曹操从盗墓中似尝到了甜头，于是在其身边设“发丘（墓）中郎将”，其下置“摸金校尉”，具体负责侍卫部队和作战部队的盗墓活动。在以“发丘”（即挖坟）和“摸金”（即取宝）为宗旨的两级军官统领下，曹操所到之处，厚葬之墓没有不被掘开的，尸骨没有不被暴于荒野的。注文最后解释说，此檄文系“陈琳之辞”。

陈琳（？——217年），东汉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建安七子之一。初事何进，后事袁绍，《绍檄文州郡文》即出于陈琳之手。“袁氏败，琳归太祖（曹操）。太祖谓曰：‘卿昔为本初（袁绍字）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及父祖邪？’琳谢罪，太祖爱其才而不咎。”^[20]上文大意是：袁绍败于曹操后，陈琳遂投奔于曹操麾下。曹操对陈琳说：“卿你过去为袁绍撰写檄文，可以列举我的罪状，骂我为‘无道之臣’，可你为什么往上一路骂到我的父亲和祖父呢？陈琳立即改变态度，承认是自己的不是。曹操是个爱惜人才的人，就没有进一步追究陈琳的责任了。”

曹操当陈琳之面不否认自己过去所犯的罪状与过失，坦言“但可罪状孤而已”，表明曹操起家时确有盗掘梁孝王墓一事。另外，《曹操别传》亦有“操盗掘梁孝王墓，破棺得金宝万

斤”之记载。1992年至199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抢救发掘了永城保安山（芒砀山）一号西汉梁孝王墓和二号王后墓（或某代梁王墓），结果发现，二墓均被多次盗掘，一号墓所藏“四十万斤”黄金早已不翼而飞。此事是否一定为曹操所为，目前尚不能肯定，但从一号墓墓道塞石（即用每块重约一吨重的长方形石块堵塞墓道以防由此入内盗掘）被盗情况分析，要将几百块（二号墓塞石达3000块）巨形塞石拉出墓道而后进入墓室，只有像曹操那样动用军队才能完成。《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以及《三国志·魏书·陈林传》均不见曹操盗掘梁孝王墓之记载，显然，是其作者陈寿自斯以降（魏），以曹魏为“正统”，接受魏史官王沈《魏书》“多为时讳”所致。

关于曹操盗梁孝王墓的原因大抵有二：一是政治上代汉的需要。史载，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为西汉“高祖九世孙也，出自景帝生长沙定王发”^[21]。曹操盗汉景帝弟梁孝王刘武之墓，显然是对东汉刘氏政权的蔑视和污辱，乃至“挠折栋梁，孤弱汉室”^[22]之需要；二是军事上补粮饷之不足。东汉末年，战争频仍，土地荒芜，大量人口流失、死亡，原来生产发达的中原地区粮食尤为奇缺。曹操东征陶谦与吕布，都曾因粮饷不足而中途退兵或罢兵自守。此间曹操往返于梁国道上，必然把军饷、军粮之不足寄托于梁孝王地下“钱庄”与“粮库”上。

三

曹操盗发西汉梁孝王墓，虽然扩充了征伐势力，缓解了粮饷一时之不足，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东汉末年社会上业已存在的经济危机，相反，落了个“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23]之臣的极坏名声。之后，曹操坚持兴屯田，以蓄“军资”，逐渐收到了“国用丰赡”之效。此外，曹操从“亲临发掘”中体验了厚葬的危害，于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即平（袁）谭之后，下令“禁厚葬”，有违犯者“皆一之于法”^[24]。虽然“法”的内容不见于史载，但毕竟是从法律的层面加大了对厚葬者惩罚的力度。

曹操晚年，头痛病日益加重，每次发病，都“心乱目眩”，后悔不该杀死华佗。他自知存世的日子不多了，于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六月下《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25]。”这个《终令》即遗嘱，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是关于“寿陵”（墓地）的选址。强调“居瘠薄之地”，具体选择在邳县西门豹祠西边的高地上；二是关于坟丘的形制。可以“西原”地势的高度为基础，墓圻上不堆筑高大的坟丘，不树碑、不建祠（堂）、不列石人、石兽等地上建筑；三是关于墓地的界域。要求留出足够的范围，以备公卿大臣，有功之将死后作为一种礼遇，安葬在自己“寿陵”周围。按照汉代天子的丧葬制度，曹操的《终令》当为营建“寿陵”时间的开始，至其去世安葬，约为20个月。

曹操在下令为其筑墓的同时，并未放松对孙权和刘备的用兵。七月，他便开始了对刘备的西征。十月，魏宛（今南阳市）守侯音“苦徭役，执南阳太守东里袞反”，曹“使（曹）仁围宛”^[26]。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正月，曹仁屠宛，杀侯音。七月，孙权进攻合肥。八月，关羽围曹仁于樊城，魏荆州治所南阳发生严重危机。为了确保南土的安定，十

月，曹操不顾病魔缠身，老境摧人，于65岁高龄亲自挂帅南征关羽。其间，关羽虽然被孙权擒杀，但经此折腾，曹操的病情由是急转直下。

“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春正月，（操）至洛阳”。“庚子（正月二十三日），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遗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27]

如果说曹操的《终令》是一件有关筑墓的“遗嘱”，那么，曹操的《遗令》就是一件有关安葬的“遗嘱”了。在《遗令》里，曹操主要交代了以下四个问题。一是孙权据江东，刘备据巴蜀，曹魏尚未统一天下，丧事不能尊汉制大操大办；二是尸体入棺要穿像平时一样的服装，墓室内不得随葬金银器、珠玉器等珍贵物品；三是葬毕，文武官员即脱去丧服，不必遵守“既葬，三十六日除服”之制；四是驻防各地的将士，尤其是担负戍边屯田的将士，不得擅离职守，要各司其职。

曹操为什么要“禁厚葬”，倡导“薄葬”？除了上述所列的厚葬危害外，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曹操在《遗令》中所说的“天下尚未安定”，不能将“财力尽于坟土”，而应将财力用于国家的统一战争中；另外就是曹操羞于启齿，防范自己的坟墓像梁孝王陵墓一样被日后盗掘的问题。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云，曹操死后，其子曹丕继承曹操为魏王，丞相兼冀州牧，追尊曹操为“武王”。因曹操于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被东汉献帝晋爵为“魏王”，故曹操谥曰“魏武王”。二月丁卯，丕按照曹操的《遗令》，将其父亲葬于“寿陵”，即“高陵”，又邙县“西门豹祠西原上”。

四

曹操死后，其“寿陵”是否如《终令》所说“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坟上“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入棺“敛以时服”，墓室“无藏金玉珍宝”，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日前揭开了这一千古之谜。

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等在京举办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曹操墓此前再次被盗后，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经科学发掘，在安阳发现的经过与阶段性研究成果^[28]。根据现已公布的材料，本文支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大墓为曹操墓的初步结论，理由如下：

其一，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曹操大墓的地理位置，与曹操《终令》所嘱“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及东晋十六国后赵鲁潜墓志提供的“故魏武帝陵”在其墓明堂东南约300米的范围内一致；

其二，墓上无封土、祠堂、碑碣、石人、石马，与《终令》“因高为基，不封不树”一致；

其三，墓圹规模宏大。墓道长近40米，上口宽近10米，最深处达15米，砖石结构，墓室平面布局呈“甲”字型，由墓道、墓门、前室、左右侧室、后室几部分组成。特别是用长0.5米，宽0.25米的青砖营造墓室，用长0.95米，宽0.90米，厚0.2米的青石铺垫室地。墓室空间高达6米以上，墓室面积总计达380平方米，为另类“地下宫殿”，与两汉考古习见的侯王墓一致；

其四，墓中出土的石器、玉器、陶器、铜器、铁器、漆器、五铢钱等均为东汉风格。而墓中出土的画像石室（椁）残块，则与东汉末习见的内容，以及凸面阴线刻雕法一致；

其五，墓中出土的“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石碑，为一具“遣策”性质的遗物。“遣策”见于《仪礼·既夕礼》：“书遣于策。”郑玄注：“策，简也。遣，犹送也。谓所当藏物茵以下。”战国秦汉时期，多用竹简编成簿册，如西汉初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之“遣策”，由132枚长27.6，宽0.7厘米的竹简，以细麻绳分上下两道编束成册，为记录各种随葬品名称，数量之清单。此“遣策”与马墓不同的是，用石碑代替了竹简，用石刻隶书代替了墨书隶体。由此可以确信，该墓应随葬有一件魏武王生前“常所用格虎大戟”的武器。虽然由于该墓多次被盗之原因，现已无从对照“格虎大戟”的有无，但不能否定的是墓中尚留一件未被盗掘的、记录随葬“格虎大戟”的个体，即清册的存在。由于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曹操被封为“魏公”、“魏王”、“谥武王”，所以，该墓为曹操墓无疑。

另外，从现代盗墓者手中收缴的“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与“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枕等遣策、实物如确系墓中出土，则有力补证了墓主人不可以动摇的身份。

鉴于以上间接证据，直接证据与补充证据组成了一个证据链，故，可以初步肯定地说，安阳西高穴大墓为魏武王曹操墓。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曹操墓多次被盗，墓中出土的一件年龄较高的男性头骨已看不出与该墓中被盗的“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枕之间的并存关系。如果头骨与慰项石同处于后室西部处，即主室木棺头部处，该头骨或应成为墓主人曹操的头骨。反之，即头“石”异处，无疑将会增加断“首”考古的困难性。

“不封不树”且“无藏金玉珍宝”的曹操墓何以多次被盗？首先是汉代是个厚葬成风的时代，曹魏以后的盗墓者根本不相信被东汉献帝封为“魏王”、魏文帝、“谥武王”的曹操“无藏金玉珍宝”以葬。事实上曹操的“不封不树”，较之西汉武帝陵和“状如祁连山”的霍去病墓的确是座“薄葬”墓，但若考察其墓圪及墓室就会发现一座由前室、后室，以及4侧室组成的宏大墓室，不可能让起“车库”、“库房”、“藏阁”作用的“侧室”空空如也，当做摆设。因此，曹墓仍然是一座相对“厚葬”之墓，这就难免摆脱盗墓者的视线；其次，盗墓者根本不相信曹操生前“公示”的财产不会随葬于地下。据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曹操集·上器物表》载，曹操曾向献帝报告称：“臣祖腾，有顺帝赐器，今上四石铜甬四枚，五石铜甬一枚”。《上杂物疏》云，曹家有“御物三十种，有纯金香炉一枚”。“御杂物用，有纯金唾壶一枚”。“御杂物之所得孝顺皇帝赐物”，另有“容五石铜澡盘一枚”等。上述“御物”，除了部分铜器“上”（送）献帝外，其余金器等物不能排除随葬于地下的可能；再次，汉代的地主官僚阶级，还流行用印章随葬的习俗。印章有私印，也有官印。质地有金质、铜质，也有玉质。盗墓者深信曹操生前之官印或私印必将随其主人葬于地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三月，天子使魏公位于诸侯王上，改授金玺·赤绂”。《献帝起居注》曰：“使左中郎将杨宣、亭侯裴茂，持节印授之”。又，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夏五月，天子进公（曹操）爵为魏王”。《魏书》云“今进君爵为魏王，使使持节行御史大夫宗正刘艾奉策玺”授之。此“魏公”之玺（印）和“魏王”之玺（印），既为官印，又为曹操之所有，按照当时的葬俗，应随曹操之去世而葬于墓内。如是，此二金印必将成为盗墓者不择手段的攫取对象。

值得一提的是，古今盗墓者的盗墓活动，不仅破坏了曹操墓的完整性、系统性与原状态，给文物考古工作者带来了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困难，而且是造成对西高穴大墓的主人产生疑问的

主要所在。庆幸的是具核心和关键证据的墓的形制、结构未被破坏，“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简称为“魏武王戟”石碑未被盗掘，这就为断定该墓的主人即曹操，提供了同“魏武王”印玺与“魏武王”墓志一样重要的证据

不过，时下也不能把话说绝。鉴于曹操生前有过盗墓的经历，具有一定的反盗掘能力；加之曹死后有“七十二疑冢”之说，故曹操将自己的坟墓伪装成“尸棺墓”、“衣冠冢（只埋死者的衣冠等遗物的坟墓）”或其他墓也未必不无可能。但即便如此，西高穴墓也一定是其中二墓或多墓中之一墓。

据墓中出土的“石碑”考，曹操使用的“格虎大戟”与“格虎大刀”，应为曹操生前经常使用的武器，或许伴随其有过出生入死的经历，故其死后随葬于身边，起怀旧和镇墓辟邪的作用。令墓主人没有想到的是能够克敌御虎的“大戟”、“大刀”并没有抵御着一切盗墓者的盗墓活动。相反，连记录随葬品的清册之一，即“格虎大刀”石碑也被现代盗墓者盗了出去。盗墓者的肆意妄为，已达于疯狂的地步，以致可以说盗掘猛于“虎”。要保护地上地下文物，避免当代盗墓者因再次盗掘而引发的文物破坏和不必要的学术之争，公安机关必须依法惩治文物破坏和盗掘古墓活动。

注释：

[1]《隶释》七《汉冀州刺史王纯碑》云，王纯东汉延熹四年（公元161年）八月二十八日甲寅殂，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丙申葬而立碑。

[2]《盐铁论·散不足》。

[3]《潜夫论·浮侈》。

[4]《潜无论·务本》。

[5]《后汉书·杜诗传》。

[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东汉洛阳城南郊的刑徒墓地》、《考古》1972年4期。

[7]《汉书·文帝纪》。

[8]《晋书·索琳传》。

[9]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术室《满城汉墓金缕玉衣的清理和复原》，《考古》1972年2期。

[10]大葆台汉墓发掘组等《北京大葆台汉墓》，第13页。

[1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打虎亭汉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12月。

[12]《汉书·陈汤传》。

[13]《潜夫论·浮侈》。

[14]《后汉书·郑玄传》。

[15]《后汉书·明帝纪》。

[16]《后汉书·中山王焉传》。

[17]《后汉书·光武纪》。

[18]毛泽东《同保健医生的谈话》。转引自柳春藩《正说曹操》第389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10月。

[19]《史记·梁孝王世家》。

[20]《三国志·魏书·陈琳传》。